

论徐润买办期间创业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形成

□张世红

[摘要] 徐润买办期间因地位的卑微促使他奋发图强、刻苦学习,形成了他的创业精神;同时西方列强的疯狂掠夺和贪得无厌,使他对洋人、洋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促使他民族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 徐润;买办;创业精神;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 K820.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4)02-0135-04

On the Formation of XU Run's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National Awareness during His Compradorship

ZHANG Shi-ho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4, China)

Abstract: During XU Run's compradorship, his humble status helped develop his enterprising spirit, while the rampant pillage of the western powers helped him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eigners and the foreign banks, thus his national awareness was shaped.

Key Words: XU Run; comprador; enterprising spirit; national awareness

一、导论

关

于买办阶级性质,史学界许多前辈进行过研究并有不同的观点。聂宝璋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社会阶级。它是侵入这个社会的外来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相结合的产物”;^{[1](P1)}黄逸峰等认为“旧中国的买办、买办制度、买办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买办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而一手培育起来的”。^{[2](P1)}汪敬虞认为:“买办阶级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阶级”。以郝延平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持“中介论”。“以中国买办为中介,东方和西方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相逢了”,“买办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3](P1)}国内有部分学者附和这个观点。而韩仕海则认为“根据买办的职业属性应将其界定为一个经济概念,经济范畴中的买办在政治上凸现出来明白无误的奴性与对国家民族观念的缺乏。买

办对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因而买办是一个不值得肯定的阶级”。^[4]综述以上观点,对买办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评价观。(1)否定观。以聂宝璋、黄逸峰、汪敬虞、严中平四位为代表的史学前辈从政治的角度,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完全否定买办阶级,认为他们是一个彻底的“反动阶级”。(2)肯定观。国外学者马士、郝延平、刘广京等则从东西方“中介人”的角度完全肯定买办。认为买办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中介作用。买办不仅是一种新型商人,而且是集工业投资者的买办、工业管理者的买办和企业家的买办于一身的近代化的推动者,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突出的作用。(3)辩证评价观。以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国内学者为主,他们既批判其买办的落后反动性,又肯定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如:韩仕海的《买办再界定》,贺水金的《买办新论》,马俊亚的《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与中国近代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买办与非买办》,王湘林《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金普森、易继苍的《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石志新的《浅析

买办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买办进行了辩证的评价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买办投资近代民族企业促进中国近代化的积极作用,又否定其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中充当帮凶,为虎作伥的反动落后性。

笔者认为,以聂宝璋先生为代表的否定观只注重买办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与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以及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中表现出的买办性和奴性,但对买办投资近代民族工业,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积极性,对买办在买办期间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进取性,在经济活动促进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近代经济的产生和促进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进步性和在中外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中的中介性都未从肯定的观点来论述,对买办的评价欠客观、公正性。以郝延平为代表的肯定观只看到了买办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起到的桥梁和中介作用,但对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帮凶作用及反动落后性避而不谈也是不客观的。而辩证观以辩证的肯定和辩证的否定为依据,客观地、一分为二的评价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对买办的评价缺乏系统的综述的论述。本文想就徐润买办期间创业精神和民族意识进行论述。

二、徐润的买办生涯

徐润,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生于香山北岭乡老屋。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洋务派官僚。他于咸丰二年(1852年)入宝顺洋行学艺至同治七年(1868年)脱离宝顺洋行自立宝源祥茶栈,共十六年买办生涯。

徐润出身于买办世家,他的伯父徐昭珩(钰亭),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总理上海宝顺洋行(Dent and co)。咸丰二年(1852年)“宝顺洋行旧东必理氏去世,韦伯氏接手,先伯总理行内办房事务”。^{[5] (P3)}徐润15岁就在宝顺洋行学艺办事。“固留宝顺洋行学艺办事,师自曾寄圃”。^{[5] (P3)}徐润在洋行最初学丝茶,至咸丰六年(1856年)升为帮账上堂兼充各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为主账上堂督理各职,这时二十四岁的徐润已成为宝顺洋行自己培养出来的青年买办。在徐润的主持下,宝顺洋行在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汉口、九江等处分设了“办房”(分行),加上原有上海、香港两处分行,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北到天津、东北到牛庄、西到汉口、南到香港的洋行体系。“上年派去各埠办房,如烟台梁枝,天津亚培、徐子荣,牛庄陈洛明,镇江黄墨砚,芜湖冀燕山西友,九江徐渭南、郑济乐,汉口盛恒

山、杨辉山”。^{[5] (P7-8)}在此基础上发展到南洋的暹罗、新加坡。“往来一律……或带镇江,或交上海……另有南洋暹罗,新加坡各埠运来檀香……连东洋、北三口、长江一带、香港、福州进出”。^{[5] (P11)}徐润主持下的宝顺洋行积极开展在长江中下游和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业务。他们收购丝、茶、土特产以供出口,并在国内推销价廉物美的洋货。每年进出口金额高达千万两,在洋行中首屈一指。

宝顺洋行最初的业务就是从丝茶开始。徐润刚到宝顺洋行时,“看丝之西人名韦伯氏,茶师西麦氏”。^{[5] (P3)}咸丰十年(1860年)“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方……办得白毛茶八百箱……候至次年,在宁州办得乌龙细条红茶二百箱……大得其利”。^{[5] (P7)}“至宝顺洋行生意,进口货如大小洋药……夹板船装来洋货约有三四十船……另有南洋暹罗、新加坡各埠运来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点铜四五船,至于出口货如湖丝、棉花、红绿茶等约值千万……并计总在数千万,实为一时之盛,洋行中可屈指一指者也”。^{[5] (P11)}宝顺洋行还积极从事航运事业,其船队拥有江轮、海轮等数十船。“当时有长江轮船四只:一总督、二飞似海马、三气拉度、四哥系么布礼。另申港轮船二只:一扬子,二鲤鱼门。又大小夹板船二只:一允德、二米湿化”。^{[5] (P10)}徐润主持下的宝顺洋行在收购丝茶等土特产品出口推销价廉物美的进口洋货和从事航运业务的过程中,为宝顺洋行赚取巨额利润,使宝顺洋行在各洋行中独占鳌头。

徐润在宝顺洋行买办过程中,也积极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其经营项目包括丝、茶、麻、棉、烟草、桐油、烟土等。他名下的商号就有上海绍祥丝、棉行(咸丰九年,1859年)、温州润立生茶号(咸丰十年,1860年)、河口福德泉茶栈、河口永茂茶栈、河口合祥茶栈(咸丰十年,1860年)等,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合股开设敦茂钱庄。徐润的商业活动范围很广,从上海到浙赣山区,从长江中下游口岸到沿海各埠,都有他商业活动的踪迹。

三、徐润买办期间的创业精神和民族精神

徐润买办期间因地位的卑微和与洋行存在的奴隶关系促使他奋发图强、刻苦学习,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使他终身受益;同时他还目睹上海成为列强的侵略焦点,租界遍地、洋行林立,列强的疯狂掠夺和贪得无厌的侵略本质使他对洋人、洋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时刻保持对洋人、洋行的警惕性,这就促使他的民族意识的形成。

1. 徐润买办思想意识的折射

19世纪的中国买办实际上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主奴性质的雇佣关系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贵贱和尊卑观点深刻影响下的中国买办对洋行的表现是绝对服从和忠实可靠。容闳在1858年婉辞宝顺洋行命其担任日本长崎买办时说:

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予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人虽有时困于经济,不得不屈就贱役,为稻粱谋,第予之贫乏尚未至此。^{[19] (P106)}

容闳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在当时的士大夫心理中,买办的职位近似卑微,地位为奴隶。事实上在具体的工作中,买办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徐润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为“主账上堂督理各职”,宝顺洋行的行东韦伯训话:“今君乃总行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惟君是问。”^[15]徐润是韦伯的亲信买办,其伯父徐钰亭又担任“主账上堂督理各职”多年,这种人际关系下主奴关系还如此淋漓尽致,其他买办就可见一斑。徐润的好友、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在十年买办的生涯中也充满屈辱感。唐廷枢1863年开始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分管金库,到1865年2月,怡和洋行筹办钱庄,限制唐廷枢的权利;1866年11月,林紫奎、葛仰高事件,行东对他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强,唐廷枢权利只到应付零星开支的地步;1868年因附股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并充任华籍董事,遭洋人非议,怀疑他在洋行有贪污行为;1871年行东对唐廷枢的怀疑变成行动,罗织其罪名是盗用洋行库款进行自己的商业活动。无论是徐润,还是唐廷枢及其他买办,面对这种卑劣的地位,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心理上一方面是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就是刻苦好学、奋发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博取主子的欢心与赏识。同时,由于买办是在洋行工作,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伎俩非常了解,因此在许多买办中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日益强烈,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就是典型代表。

2. 徐润买办创业精神的形成

徐润在宝顺洋行的工作,表面上看与洋行是雇佣关系,是老板韦伯的亲信,但仍掩盖不了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掩盖不了寄人篱下的卑微地位。为了摆脱命运的十字架,他只能刻苦好学,努力工作。百折不挠去面对现实,面对工作,促使他创业精神的形成:刻苦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见贤思齐的精神,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咸丰三年(1852年)徐润到宝顺洋行学艺,不但“学丝、学茶,不分彼此”,“春学丝缕,秋学茶”;而且“黎明即起习

字数百,又学算于阙筑甫”。^[5]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连洋行的外国技师都非常赞许:“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5]早年形成的这种精神一直影响徐润的一生。他一生从事实业六十年,有成功、有失败,但他不畏困难,不畏失败,一直保持这种精神境界。“其间囿于势,限于时,成者七八,不成者二三,开创伊始,虽殚竭经营集群策群力以从事,往往垂成中止,雨翁则未尝告劳焉”。^[6]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上海影响较大,尤其是从事商业的徐润受损更大。“上海为中外总枢,以致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商市奇缺,周转不灵,致败坏几不可收拾,艰难创就,尽付东流,他人处之,当不知如何愤懑矣,乃雨翁自书一联云:‘放宽肚皮装气,咬紧牙根吃亏’”。^[9]后虽年事已高,亦老当益壮,奉李文忠公之命创办矿业,其艰难备尝,不言而喻。“创建平、续办永平,兼热河合办各矿,榆关十载,马瘃仆痛,艰苦备尝”。^[6]徐润在买办时期形成的创业精神对他一生的事业开创很有裨益,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虽几经挫折,亦不气馁,在接管轮船招商局,创办矿业的过程中虽有艰苦,亦有人言,但他始终如一,奋斗不止。即使73岁高龄,亦“不容少懈,其精神矍铄,诚非常人所能及”。

3. 徐润买办期间民族意识的形成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结束买办生涯后迅速转变为民族资本家,走“实业救国”之路,为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和中国工业的近代化而奋发努力并作出重要贡献。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应追溯到买办期间的民族意识。他们作为贫苦的农家子弟从农村走向大城市,走进向外国资本家开放的洋行,不仅感到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亲自感受到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施加于中国的侵略伎俩,也亲身感受到在替洋人经营的经济活动中,大量钱财被流失,被掠走,其骨子中的民族意识猛然觉醒。徐润在买办期间就已形成他的民族意识。1852年徐润15岁随叔徐荣村到达上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十里洋场,租界、洋行林立,上海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焦点。徐润学艺的亦昌号、丝荣号,“当时为南北大道咽喉之区”,^[9]英、法、美相继在这里开辟租界。“自洋泾桥至苏州河,东至浦江,西至福建路,属英租界”;“东至洋泾桥,循河西岸直至老北门为止,均一片旷地,属法租界”;“又复占及浦北地,自跨有苏州河立为美租界”,“今美界已占至宝山县界矣”;“又复于泥城桥之西,老闸桥之北占为公共租界,一切布置均不亚于英租界”。^[5]随着租界的建立,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行接踵而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今五马路边,有指望洋行”,“今之三井洋行之南”,“有比利士勿洋行”,“洋泾桥边有裕丰洋行”,“继有天祥、长利、新旗昌、公易、华记、新关、宝顺、李百里、丽如、

裕记、广源、仁记、和记、怡和等接踵而来”，“英商兆丰洋行就该处建造外大桥”。^[5]近 20 家外国洋行在短时间就在上海建立起来，迅速开展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徐润面对列强的侵略，既愤慨，又担心，“然尚不知厌足，日谋扩充，日图推广”，使中华民族“政令不行，主权日削，曷胜浩叹”。^[5]列强疯狂的经济侵略和贪得无厌的侵略本质催生了徐润早期的民族意识，并对徐润以后的商业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后不管他从事什么经济活动，都对洋行和洋人保持高度的警惕。1873 年旗昌洋行卖劲地拉拢他任上海买办，他不但拒绝旗昌洋行的要求，而且毅然投身到民族工业中，与好友唐廷枢改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最大的国有民族企业。他和唐廷枢在改组轮船招商局的过程总是时刻对洋行提高警惕。《轮船招商局局规》明确规定：“凡有股份者如欲将股份单转售别人，先须先赴本局告明，以便注册。惟只准售于华商”，^[5]而“不准让与洋人”，“以杜绝洋人借名之弊”。这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招商局的主权只归中国人所有，预防招商局落入洋人之手。1873 年《徐润致盛宣怀函》则表示得更明确：“永宁”、“满州”“将业剔除洋人股份，即可清领牌照，换用旗式”。^{[7] (P5)}这种朴素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发展就是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与洋商抗争，走“实业救国”之路。徐润后来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

同》等方面都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致力于抗争，敢于收回国家的利权，这就是他买办期间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发扬光大。 ■

[参 考 文 献]

- [1] 聂宝璋.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79.
- [2] 黄逸峰, 等. 旧中国的买办阶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
- [3] 郝延平著, 李荣昌, 等译. 19 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8.
- [4] 韩仕海. 买办的再界定[J]. 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9, (2).
- [5] 徐愚斋自叙年谱[Z]. 1927.
- [6]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7] 徐润年谱·序[A].
- [8] 汪熙, 等.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样之八[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 2003—09—25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黄少梅]

[作者简介] 张世红(1968~), 女, 湖北沙市人, 暨南大学 2002 级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邮编: 510634.

作者来信 杰舜主编:

兹寄上拙作《序·羌在汉藏之间》中英文摘要改写稿各一份, 请得便在下期学报中刊出。其他改正部分, 则在参考文献上, 两条参考引用书目作者皆错, 亦未列出期刊名称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 正确情形列下:

张光直:《延续与断裂: 一个文明起源新论》,《中国青铜时代》第二册,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2.

李亦园:《传统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汉学研究》第十二卷第一期, 页 1~26, 台北, 1994.

又五月里在宁夏的论坛, 我原则上希望能来, 乔健与庄英章两位也计划一同来参加, 后续的事, 再进一步联络。

专此顺祝

研祺

李亦园承启 2004. 2. 12

族群关系脉络的反思——序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李亦园

摘要: 本文是为王明珂教授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所写的序言, 也可以说是为这本探讨民族边界与文化互动的新著作所作的导读, 所以征得作者与著者的同意刊载于本期学报上。本文作者对王教授以羌族为例分析说明汉藏两大民族之间, 族群与文化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 以及对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nationality)概念的重新检讨至为推崇。而他自己则认为“民族”或“族群”这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 是把一个连续谱来作一种主观的切割, 所以经常因论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

Rethinking on Ethnic Boundaries and Their Identification

——Preface to Wang Ming-ke's New Book on Qiang Nationality

Yih-yuan Li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his article is a preface for the book "The Qiang betwixt and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by Professor Ming-ke Wang. It can also serve as a reader's guide to this new book which is resulted from a field research on ethnic boundari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Western China.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Professor Wang's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Qiang's ethnicity was put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wo ethnic groups, namely Han and Tibetan, their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ethnic identity is highly subjective and arbitrary, like the early men's effort of grouping or classification of objects as means to achie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which is in fact a continuum. A researcher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subjective nature of labeling in approaching ethnic identification.

主编回应 由于编辑工作的失误, 使 2004 年第一期发表李先生大作的中英文摘要有误。李先生治学严谨, 且对后学关怀备至, 专函予以纠正, 使本刊同仁受到一次生动的学术规范教育, 谨此向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引以为戒, 努力提高本刊的编辑质量, 以不辜负李先生及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厚爱。